

中研院院士暨長庚醫院內科肝病腸胃科醫師廖運範，是國內知名的肝病權威。師承台灣肝病之父宋瑞樓，投入B型肝炎研究多年，他對慢性肝炎的臨床發展瞭若指掌，並在肝臟病的治療與投藥上有豐碩的研究成果。

廖運範自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先後在北大、蔡總醫院服務。一九七六年加入長庚醫療團隊，創立長庚肝病研究中心，帶領團隊長期追蹤肝炎病患的病史，並在二〇一一年彙整出版《迎戰B型肝炎》一書，詳實記錄台灣B型肝炎發展的背景、歷程及成果。此外，廖運範對B型肝炎治療投藥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更在二〇一三年的歐洲肝病研究學會中獲頒國際終生成就獎。

●勇敢選擇 努力把它做好

出生在桃園縣觀音鄉的廖運範，形容自己的個性就像典型的客家人：「敢言、直言，非常擇善固執，不符合我的原則的事情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性格讓他在面臨選擇時，比起其他人更有勇氣面對未知的挑戰，也更堅定自己的態度。他說：「我就是選擇我認為應該做的，然後很努力把它做好。」

廖運範在擔任第一年住院醫師時，被分配到病理科訓練六個月，無法直接接觸病患，只能對器官檢體做病理檢驗分析。多數初出茅廬的住院醫師無不祈求自己能避掉這樣的「機會」，然而這半年的經歷竟成為廖運範踏入肝臟病研究的契機。

在病理科期間廖運範參與各科病例討論會，遇上組織檢查的案例時，還必須往返內科與病理科之間，向當時的教授宋瑞樓請教，釐清檢驗結果，並在科內討論會上報告。這樣的經歷讓廖運範體會到對病患應該追根究柢，而不是隨意下診斷，唯有經過科學檢驗，才能真正找到源頭與根治的方法。



長庚肝病研究中心冰庫，保留了無數的病患血清紀錄。(戴裕備/攝)

廖運範

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

廖運範在訪談過程中提到，一項藥品是否具有療效，是需要經過長時間檢驗的。(戴裕備/攝)

記者戴裕備/報導

雖非自願到病理科受訓，廖運範仍然把握了這六個月的時間積極學習。尤其當時肝炎等肝病是台灣很常見的疾病，在病理科很常接觸到這類病例，廖運範不僅主動閱讀相關書籍《肝臟結構與功能》，碰到問題也總是想辦法弄懂，開啟了他對肝臟研究的興趣。

●創辦期刊 分享資源教材

後來面臨選科時，有幸獲得肝病之父宋瑞樓的青睞，加入研究團隊，廖運範從此一腳踏進肝病研究的世界。提到這段經歷，他仍掩不住興奮地說到：「可能就是因為在那半年跟宋瑞樓教授的互動得到他的肯定，後來宋教授竟然主動問我要不要加入他的研究團隊，真的是無上的榮耀。」



廖運範辦公桌上，擺滿了病例紀錄。(戴裕備/攝) 廖運範將蘇東坡的詞抄寫下來的手稿。(廖運範/提供)

跟隨宋瑞樓進行研究的廖運範，在當時已有能力於國際研討會中發表論文，表現可說是同輩學生中數一數二。一九七三年收到中部私立醫學院邀請擔任兼課老師的廖運範，有感於私校醫學生資源匱乏，興起了創辦醫學期刊，提供醫學生自學教材的想法。

不顧當時俗諺「要一個人破產就叫他去辦雜誌」的說法，在醫師月薪僅有四千塊台幣的困境之下，廖運範召集了十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功募集到十三萬元出版刊物登記費，出版了《當代醫學》月刊，每月彙整台大醫院研討會、病例討論的內容，邀請醫院教授撰稿，或是翻譯國外醫學相關研究報導。

然而，充滿熱情與理想的廖運範在創辦刊物的過程中，也體認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樣認



同資源分享的理念。邀稿時，不僅遇上醫界前輩冷眼旁觀，更有「廖運範才剛升主治醫師就急著出名、賺錢」的說法傳出。聽到這樣的傳言，廖運範覺得滿悲哀的，他認為台大醫學院是醫界的龍頭，應該要充滿理想性，然而事實卻非如此，他毅然決定離開台大醫院。他說：「我完全了解自己是在龍頭老大(台大醫院)的地方當醫生前途無量，假如我離開了就是到江湖闖蕩了，但我就這樣選擇了。」

●從零開始 研究B肝40年

廖運範在一九七六年轉任長庚醫院，創立長庚肝病研究中心。離開台大醫院的他認為：「我的主戰場是看病，那我只要態度一樣，在哪裡看病人都是一樣的。然而醫學界卻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廖運範蛋蛋了，薪水越換越高、地方越換越糟。』」也曾經在回台大開會時，遇到有人揶揄他：「廖醫師你在長庚做得好，我們都覺得你跟開業醫師不一樣。」

面對這些話語，廖運範只是一笑置之，因為這個轉換給他更多實踐理想的空間。少了台大的設備和研究基礎，在B肝的研究上必須從零開始，從留下病人血清建檔做起，漸漸地才擴大設備與規模。他說：「研究是為了解病人的問題，這需要時間累積觀察的，只要留下血清紀錄，當有新的檢驗方式與治療藥物出現，回頭再把紀錄拿出來，就可以繼續新的研究。」

就這樣從頭來過，到了長庚醫院的第六年，一篇完整的研究論文才真正完成，廖運範依舊清楚記得，那篇論文的内容是追溯慢性肝炎急性發作的過程，這是廖運範從事B肝研究以來一直想要了解的，而他在這裡辦到了。

●執著研究 堅信臨床證據

「我覺得台灣很不幸有這麼多的B肝患者，但我善用了這個不幸，更瞭解了B型肝炎的發展和治療。」廖運範認為肝病一直是台灣最嚴重的疾病，因此多年來他致力於觀察B肝患者病症發展，他說：「我擁有比英美學者更大的優勢，就是我

看過更多的病例，因此我更能看到了這個病症可能產生現象的全貌。」

對於B型肝炎的投藥治療，廖運範一直與主流英美派的學者持不同看法，更帶領亞太肝病研究會制定用藥與停藥標準。雖然在國際研討會或期刊上常受到挑戰，但廖運範相信從病人臨床經驗所歸納的科學證據，才是真正符合治療的準則。

一半以上的人生都投注在B肝研究的廖運範，二〇〇七年受邀到日本亞太消化系醫學學會，主講B型肝炎發現後四十年間亞太地區對B肝所做的研究與貢獻，回國後竟被檢出罹患大腸癌，讓他有了為台灣B型肝炎研究史，留下紀錄的想法。從早期全民注射B肝疫苗到今日的研究，廖運範幾乎沒有缺席，花了兩年時間，記錄重要的台灣學術論文發表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過程中各團隊遇到的困難、發生過的有趣事件等，在《當代醫學》期刊連載刊登，並在二〇一一年集結成冊，出版《迎戰B型肝炎——從台灣經典講起》一書。

現年七十好幾的廖運範，每天仍準時到辦公室報到，他亂中有序的辦公桌上擺滿了病人的看診紀錄、待審查的研究計畫和論文。回顧自己的人生經驗，他覺得就像Frost的詩《The Road Not Taken》所寫的：「選了一條人跡罕至的路，未來就此不同。」

「從台大到長庚，我選了一條沒有人走的路，而我的結果也完全不一樣。」不論是當初迫於無奈到病理科學習，或者是後來毅然決然走出台大，廖運範都秉持一貫的態度。他說：「只要決定做了，就是好好地做好，那我就會有所收穫。」



廖運範至今用來觀察檢體的顯微鏡，仍是最初來到長庚醫院所使用的那台。(戴裕備/攝)

採訪側記

原是文青 寫作譯著源自初心

前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曾在廖運範《迎戰B型肝炎》新書發表會上，稱讚廖運範的中、英文造詣。事實上，除了醫學成就，廖運範也翻譯過不少國外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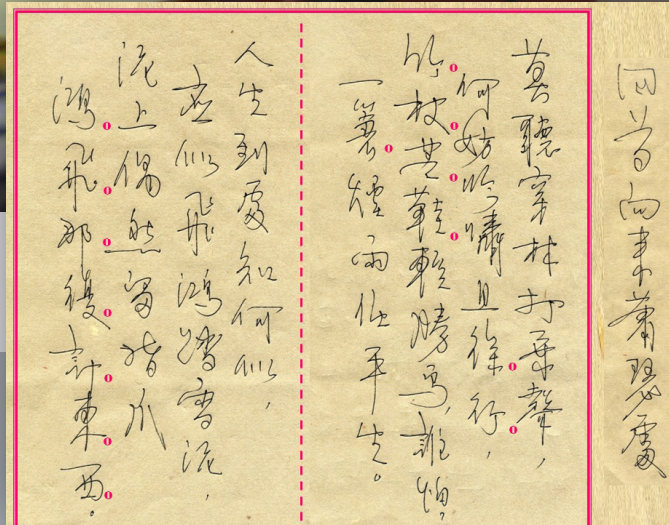
中學時，廖運範本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對文字非常有興趣的他，喜歡讀詩和散文，尤其

對蘇東坡的詞讚不絕口，隨口就能念出蘇軾的《定風波》，他說：「蘇東坡那種豪放瀟灑的性格，是我很喜歡的。」

大學以後，廖運範則利用寒暑假時間，到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借閱外雜誌看，有一次讀到報紙上可怕的翻譯，把整形外科(plastic

surgery)翻譯成「橡膠外科」，時差(jet lag)翻成「噴射腳」，他說：「看到我都快跌下來了，所以決定自己也翻看看。」

他第一次翻譯的文章，是同學從國外寄回來的雜誌文章《文學與醫學》，主動投稿中央日報副刊，竟然被連續刊載三天。後來也陸續翻譯了新



廖運範抄寫的蘇東坡詞手稿。(廖運範/提供)

小檔案

廖運範，一九四二年出生於桃園縣觀音鄉。曾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隨台灣肝病之父宋瑞樓進行研究，協助長庚醫院創立肝病研究中心。一九七三年創辦《當代醫學》期刊，二〇一一年出版《迎戰B型肝炎》一書，二〇一三年獲頒歐洲肝病研究學會國際終身成就獎。

蕭開平

記者黃莉/報導

法醫辯冤白謗 為死者說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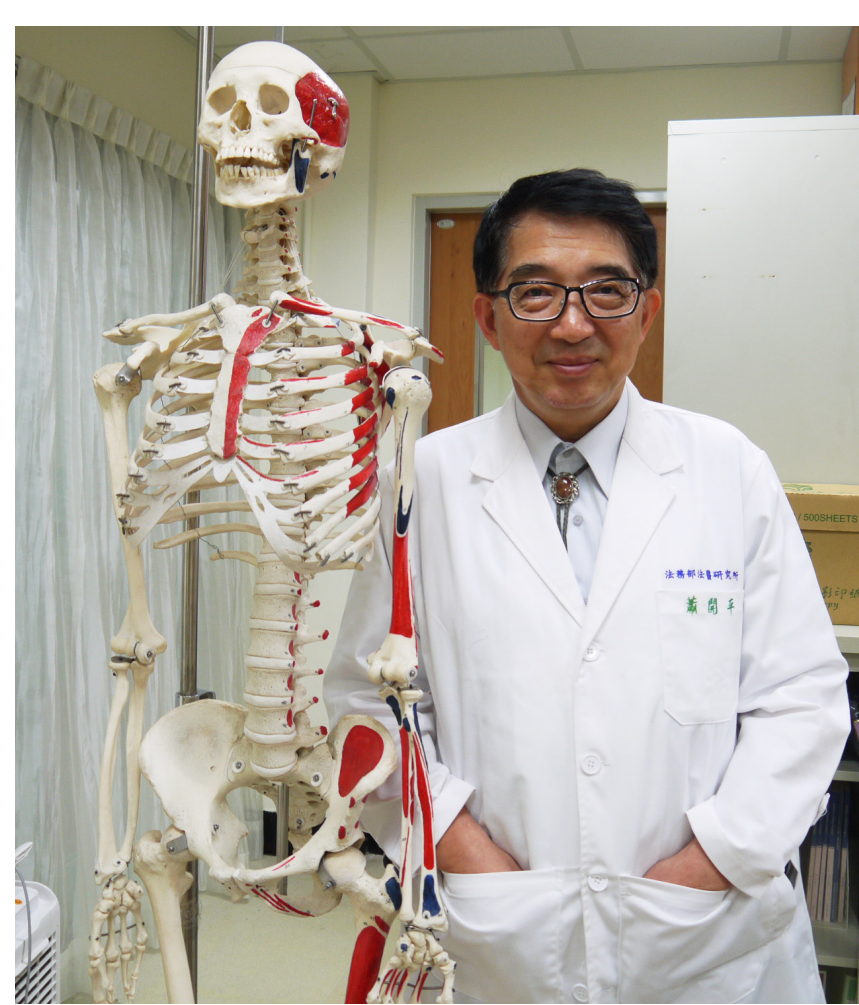
屍，法醫們猜測這具屍體有可能是從災情嚴重的屏東漂流過來的，但又認為依常理判斷屍體漂流速度可能這麼快。後來做DNA檢驗後確定屍體屬於屏東人，因為兩勢力強烈造成流量增大，加上洋流的推波助瀾下，只花了一天的時間就從台灣最南端漂流至最北端。

●客觀實證 堅持虛心拉鋸

蕭開平說，從八八風災案件中不難發現，法醫不需要精通醫科專業，知識範疇更要擴大至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各方知識，才能幫助死者發出正確的聲音。「法醫一定要了解世界所有的事情後，才知道死後發生什麼事。」蕭開平帶著近乎哲學的角度，看待以科學為主體的法醫工作。

除了不斷接受快速更新的科學資料，更需要有開放的心態接受別人的批評與建議，「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知道就要有所堅持，這很難！」蕭開平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搖搖頭。一方面要堅持法醫自身的專業性，不能讓別人隨便更改報告，但別人批評自己的報告時，又要虛心地接受檢討，客觀公正的同時要有很大的海量，虛心接受別人建議的同時卻要堅持己見。改變與堅持的拉鋸，是法醫永遠的課題。

法醫工作之所以讓人敬而遠之，是因為法醫每天接觸的都是別人生命的終點，面對的是每個人一生所承受最沉重的時刻。面對巨大的心理壓力，蕭開平以「同理心」和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相處。蕭開平坦言，剛開始入行時，的確每天會覺得很不快樂，尤其是剛結婚生小孩那段時



蕭開平與真人骨頭Lucy合影。(黃莉/攝)

間，每當解剖到小孩的屍體，都難過到像解剖自己的小孩，無法下手。

●秉同理心 視家屬如親人

但之後他慢慢把這種狀態轉變為幫助死者的情境，想辦法發掘真相，說出死者想說的話，用愛的精神看待每位死者，並用快樂的人生觀，紓解工作壓力。面對死者家屬時也用同理心對待，「你看到每個家屬都要想到，這個家屬不好就是你的親人。」蕭開平常常跟同仁這樣說。

他分享一個故事，有一位老婆婆被巴士撞傷而住院，經診斷後發現有胃出血的現象，出院後隔兩天過世。到底老婆婆過世是因為自然疾病，還是車禍導致的死亡？對蕭開平而言，這是很難的抉擇，若將老婆婆寫成意外死亡，司機就要以過失殺人入獄服刑；但若將老婆婆寫成自然死亡，她的家屬得不到保險金，要判意外還是自然死亡？

「很難，每個案子都是天人交戰，怎麼判都不對。」蕭開平說。法醫，因為擁有掌握他人生死的權力，更要以專業的知識評判。而老婆婆故事的抉擇，蕭開平至今心中仍沒有確切的答案。

採訪側記

記錄家史 借鏡過去展望未來

出身屏東客家望族的蕭開平，從小在台北長大，只有暑假才會回南部家鄉，從小對自己家族的歷史也不是這麼了解，直到長大後才慢慢知道，父親和祖父都是曾參與過台灣歷史的重要人物。

一八九五年，蕭開平高祖父蕭光明率領六堆義軍與日本抗戰，次子與三子都壯烈犧牲。蕭光明還發生過一個小故事，當時有位將軍要向南開墾墾丁，蕭光明同意讓將軍在蕭家，將住家當作軍營指揮所，後來軍人們開墾一段時間後回去大陸，將軍不但將軍餉送給蕭家，更回饋蕭家另一筆財富。原先蕭光明只是秉持著幫助別人的心態，但後來反而換來更多的報答。

蕭開平的父親蕭道應也有不凡的人生故事。在台北帝國大學畢業後的蕭道應，放下社會地位崇高的醫師工作，到中國大陸參加抗日，回台後，爆發二二八事件，歷經白色恐怖，蕭道應強烈的民族意識，歸因於高祖父所奠基的楷模。

蕭開平強調，觀看歷史的時候，要站在當時時代背景角度思考，當時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在日本最強悍的時候跑到大陸抗戰，「假如是我，我為什麼不會這麼硬，根本打不過，我為什麼要去打？」蕭開平很佩服父親的信心、決心跟強烈的民族意識，他以崇拜的口吻說道：「這就是父親不簡單的地方，他可以看到未來。」

歷史是一面明鏡，藉過去反映現在。蕭開平於是與蕭家人成立「六堆蕭屋文化促進會」，發揚客家傳統愛鄉愛民精神的同時，也希望藉由推廣蕭家歷史，發揚蕭家過往對社會所做的貢獻。

對應現在台灣所面臨的抉擇，發揚蕭家的未來在哪？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走？蕭開平從先祖身上學到：「時代運行的軌跡之中要有自己的身影」，而這也是文化促進會想告訴未來蕭家子孫及所有台灣人民的事。

小檔案

蕭開平，國防醫學院醫學系七十一期畢業，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藥理學博士。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組組長，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技研究所副教授。從小與同為法醫的父親進出解剖室，奠定職業志向與專業基礎，認為法醫最重要的工作是「辯冤白謗」，及以同理心幫助死者發聲。



蕭開平認為法醫工作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死者無法為法醫所做的檢驗報告辯駁。(黃莉/攝)

世界上有一種工作，專門與死去的人對話、用專業的知識替死者發聲，成為他們與外界聯繫的唯一浮木，但生者對此工作敬而遠之。這個神聖卻不受人們喜愛的工作，是專門判定死亡原因的法醫。

●追隨父親 走向法醫之路

目前擔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組組長的蕭開平，接觸法醫相關工作將近一輩子，他的父親也是法醫，很早就將他帶入解剖室，鼓勵他往法醫之路邁進。大學時蕭開平於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後來到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轉攻藥理學博士，本來抱著回台從事研究工作的打算，但由於當時台灣研究環境不足，最後還是選擇了最熟悉的家醫工作。

當蕭開平決定往法醫之路邁進，父親從抽屜裡拿出準備已久、胡適所贈的題字，寫著法醫工作是「用科學的工具和方法，來做辯冤白謗的工作」，這句話也成為蕭開平從事法醫的最主要動力。

有個法醫父親，讓蕭開平的童年經驗與一般人很不一樣。高中開始，蕭開平就跟著父親做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與解剖溺水死亡的屍體，首先要將死者的肺部用強酸溶解，離心後再沉澱，若在肺部找到砂礫，就能研判屍體為溺水死亡。為了這個研究，當時蕭開平還不小心被強酸侵蝕受傷。被問到這麼小就接觸到屍體不會覺得害怕嗎？蕭開平淡淡地說：「習慣就好。」

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法醫體系，多以法醫病理醫師為主導。在一般的醫院裡，病理醫師是所有醫生的老師，扮演監督與教導其他醫師的角色，而法醫是需要相當的經驗累積，以綜合性判定死者死亡原因的特殊病理醫師。

培養一個能獨自擔當大任的法醫師，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以蕭開平自身為例，他在快四十歲時才獨立從事第一個解剖。一個法醫師，從最基礎七年醫學系的培養，再擔任四年的病理住院醫師，到最後一年的法醫病理醫師，「十二年，醫學的教育才算是剛開始。」蕭開平說道。

●錯放一百 也不冤枉一人

「你能想像檢察官、法官調查後還搞不大清楚一件案子，我們法醫鑑定完後就要知道死亡的答案，這件事有多麼的困難嗎？」蕭開平嘆了一口氣說，法醫講求以客觀的證據推斷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解剖過程所得到的證據要跟現場狀況及背景資料符合，假如這三者無法結合，寧願「錯放一百，也不可以隨便冤枉一個人」，畢竟法醫的每個判斷都掌握他人的生死大權，尤其是他殺案件需要有一百之一、兩百的證據，才不會造成冤屈的產生，「要用科學的證據使他們心服口服，這就是困難的地方。」蕭開平說道。

每個案子都是「辯冤白謗」的過程，這是蕭開平從事法醫工作以來，看待所有事情的準則。每個案件都有冤屈，而法醫的工作就是「讓死者講話」，讓死者講話說起來很容易，但正因為死者不會說話，就算法醫判斷錯了也無法糾正，這就是法醫工作最可怕的地方。

除了一般個案案件解剖分析外，集體死亡案件中人身鑑別也是法醫的工作之一。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帶來的洪水、山崩及土石流，共造成六百八十一人死亡。當時法醫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儘快將屍體還給家屬，做最基礎的人身鑑別，幫助它們找到一個回家的路。在八八風災第二天，基隆外海找到一具漂流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一處幽靜之地。(黃莉/攝)